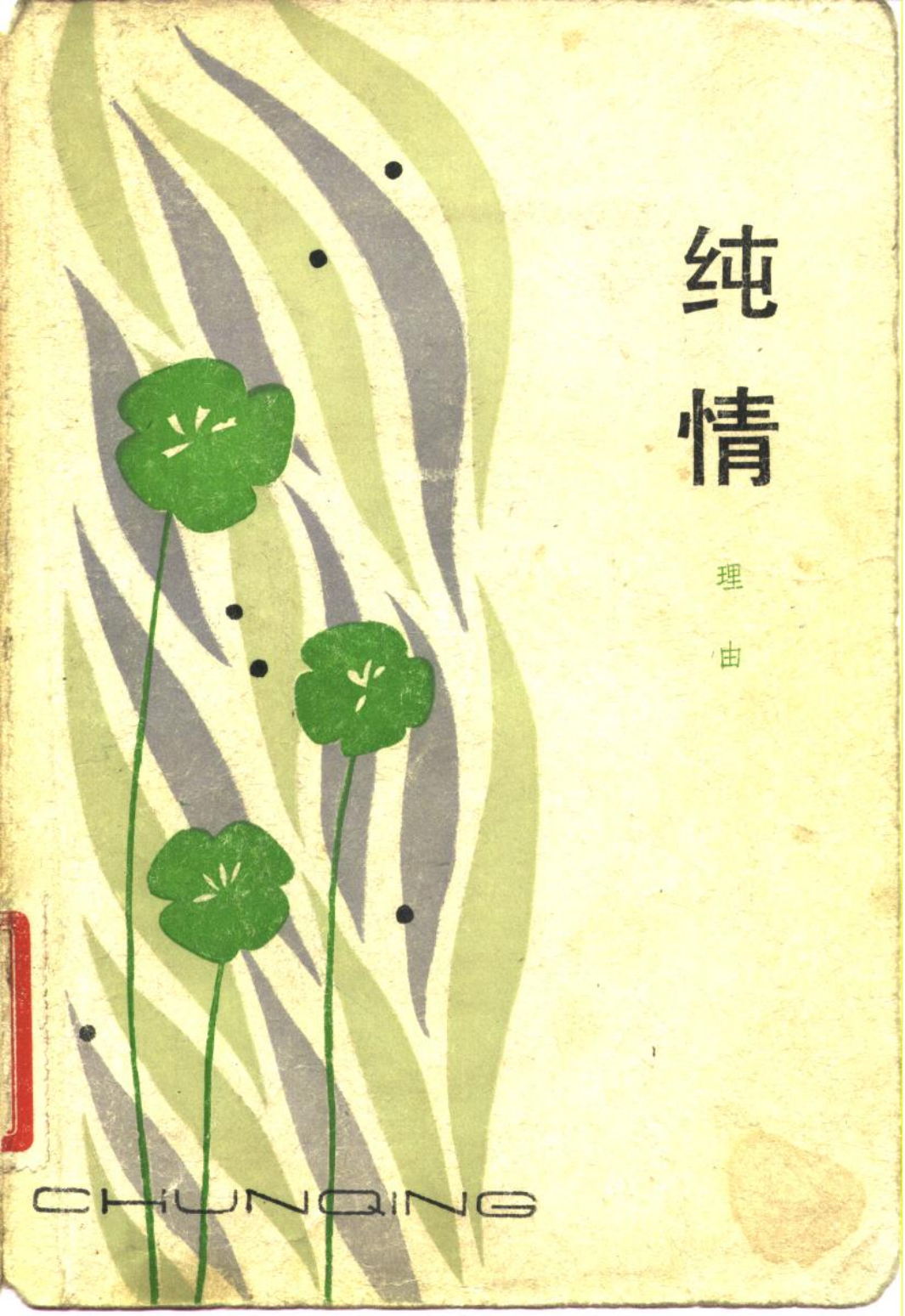


纯情

理
由



CHUNGI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文着重描写主人公——一个青年——在“文革”期间，
在家庭、学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种种痛苦的经历，以及他
在这一切痛苦的经历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如何追求真理和正义，
如何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如何为真理和正义而牺牲。

纯情

理由

纯 情

理 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1/2 插页2 字数232,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600

书号: 10151·693

定价: 0.12 元

内 容 提 要

《纯情》是作者一九八一年底至一九八三年初的报告文学作品结集。

作者在生活中观察敏锐，视野广阔，采撷精湛，抒写感人，从各个侧面表现了当前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有关改革的题材，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在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使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

目 录

希望在人間	1
園	29
• 家	44
• 純 情	59
特區行	93
• 本分人	115
鐵 血	129
發現者	151
九死一生	163
香港雨霏霏	209
后 記	329

希望在人间

引 子

本文介绍的主人公，有人称他是个梦想家，于是就从梦说起。

六十年前，在北京的寺庙里，一个端庄娴雅的少妇拜倒在佛像脚下，虔诚地献上一炷香火。进的什么庙？拜的什么佛？年深岁久的一桩小事，如今未能详考了，就算是拜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吧。在民间素有“观音送子”之说，这位少妇正是为了求子而烧香的。

苦思成梦。几天后，她果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五个男孩子围在桌边吃饭，其中一个吃了鱼肉的，忽然“哐当”一声，倒在地下昏迷不醒。其余那四个吃的是青菜淡饭，有说有笑，皮皮实实，挺欢势的。少妇把这个梦说给丈夫听，丈夫是北京第一任的电话工程师，留学日本归来的自由人士，精通技术，兼爱戏剧，对功名、利禄、子嗣之事历来持淡泊的态度，听了并未放在心上。少妇又把梦说给了奶妈，奶妈最能揣度主人的心思，顺情圆梦，只捡好听的说。她说，那个吃鱼的男孩就是女主人的头生子阿宝，不久前得了急病而夭折，天意难违，不必过于伤心，主人命中注定还有四子，大吉大福，一如北京四合

院的那副常见的门联所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少妇听了急不可待，给还没出生的男孩们取了名字，用中国奔腾不息、充满活力的四大水系来命名——江、淮、洛、汉。

梦兆与现实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后来却奇迹一般的应验了，当然这仅仅是巧合。原因在于年轻的母亲遵循了多子多福的旧习俗，不辞辛苦地与丈夫一起担起养育的责任。后来更有梦外的收获，在四男当中还生了一女。不过，子女们的命运并不象父母期望的那样顺当，而是颇多坎坷，经历过海角天涯的飘泊，人间风雨的磨难，当今大多成为驰骋于文艺界的名人。

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被《人民戏剧》誉为黄氏三杰，他们的故事有许多读者都熟知。黄宗淮早年也曾登台献艺，后来虽然改攻历史，至今仍在一往情深地迷恋着剧本创作。生长在这个家庭环境里不能不受艺术的吸引与熏陶。在子女们的记忆当中，他们那位落落洒脱的父亲的嘴里，甚至连“好好读书”这天经地义的教子之言，都未曾向他们交待过一句。在几乎是无羁绊、无差别、无冲突的和睦气氛中，任凭他们的个性象平原上的小树一样充分发展。父亲的影响是通过一条无声的线路传送的，潜移默化，铸就了子女们一颗颗善良、宽厚、正直的心。执着的追求，罗曼蒂克的气质，党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召唤，使他们献身于艺术就象川流归海那样自然。

这篇非虚构文学的“版权”，本来当属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所有。可惜近来她抱病在上海，编辑部的同志又饥不择食，急匆匆拉来一个同行后生执笔。这里，单说的是这个艺术世家的一个例外，一簇逸出的浪花，一串不协调的音符，即老四黄宗汉。

梦 话

一九七九年的初春，黄宗汉身穿一件半长不短、半新不旧的棉外衣，正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座凋敝破旧的寺庙里，面对着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几十名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和科长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就职宣言。

这个艺术世家里年纪最小的老疙瘩，如今也年近半百了。他留着一头齐齐短短的寸发，隐约露出银针似的白茬。他的面容是生动的、活泼的，富于表情和感染力。修长而弯曲的眉毛，明亮又含蓄的目光，棱角鲜明的元宝形的双唇，使人决不怀疑他就是在电影《家》中扮演美丽安详的“梅”的那位女演员的亲弟弟。如果说他与他的兄长有什么差异的话，就是显得更魁梧、更精干，也更具有男子汉的魅力。难怪他的三姐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他，若有感慨地说：“在我们家，若论搞艺术，老四是最有前途的！”

此刻，这个具有艺术秉赋的中年人，却在用流利的语气，大谈特谈其办工厂的生财之道。他说：“办工厂就应该赚钱，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就象农民种地要打出粮食一样的天经地义。年年赤字，八年亏损，难道我们能够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吗？扭亏不扭亏，难道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吗？干脆咱们讲明白一点，我就是利润挂帅，因为利润和政治是一致的。搞出优质低价的新产品，满足老百姓对市场的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说着，他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七零八落的厂房。

这座生产现代电子显象技术产品的工厂的厂址，相传原是严嵩祭祖的家庙，少说也得有几百年的历史。楼阁颓败，庭院

荒圪，如今盖起一间间临时性的简陋工棚，看上去乱糟糟的。工人们吃饭连个食堂都没有，每天开饭的时候，只能端个饭碗在露天下穷凑合。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本来由生产面包纸和糖纸的烫蜡厂、刻蜡版的誊印厂等几家手工企业合并而成。它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九五八年那场炽热的狂风，把社会上的零散劳力、家庭妇女卷入了集体经济的同盟，挂出一块块响亮又气派的招牌，而生产方式仍然是中世纪的手工作坊。不久，西伯利亚的寒流骤然刮来，对我国工业的主体造成巨大的冲击，却刺激了我国工业千万个微小细胞的生长的活力，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铁器时代向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进军。昔日严嵩留下的家庙里，也发生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变化，从生产面包纸一步跨入了生产收音机、电视机。这样的奇迹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外国人的眼里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有着可爱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和基层干部，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韧性，在两条板凳架起一块铺板的工作台上，硬是完成了上百道复杂的工序，把一台又一台自己设计、自己配套、自己制造的电视机投入了国内市场。

用破釜沉舟的精神取得的有限的成功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多年来，我们就是这么硬干的、蛮干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生产的“昆仑牌”九吋小屏幕黑白电视机，每台材料费的成本三百元，工时费和管理费的成本不计在内，等于白搭；而投入市场的售价只有二百二十元。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个厂累计亏损一千六百万元，加上依靠国家投资盖起一座楼房和增添一些设备，总计亏损两千万。争了气，亏了本；增了产，赔了钱。增产愈多，亏损愈大。这样干赔不赚的企业在全国多如牛毛，这样的经营思想在全世界却属罕见。钱从哪里

来？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长出来，却很少有人去考虑它。只能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越背越重，这个沉重的负担最终还会落到全体人民的身上。

《吉尔·布拉斯》一书的主人公从他在官场周旋的经历中悟出一个秘诀，就是每当新官上任发表演说的时候，要用最黯淡的语言把自己的前任说得一无是处，并用空洞的许诺把未来描绘得一片光明。黄厂长上任后可没这样做，他热情地赞扬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感谢他的前任完成了国家规定的生产数量的计划指标，分析了这个厂从白手起家逐步建立的设备基础和技术条件……随后，他的话题一转，干脆地说：“我这里没有空洞笼统的口号，经营方针的第一条，企业要赢利。今年做到扭亏为赢，明年成为百万富翁，后年争取向国家上缴更多的利润。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添设备、搞革新、盖宿舍、发奖金……其它一切事情都好办！”

他的话博得一阵掌声。掌声是没有字义的语言，可以表达多种含意。有的人颇具同感，出于强烈的共鸣；有的人听了怪新鲜的，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也有的人持保留态度，拍巴掌纯粹出于礼节性。掌声平息了，人们散去了，不久黄宗汉就听到对他那番演说的诙谐、刻薄的评论——“梦话！”

黄厂长上任的第一把火并没在人们的心中燃起烈焰。八年的企业亏损，使一些人认定生产电视机就该赔钱的逻辑象铁一样的冰冷。此外，还有更大的亏损——信仰的亏损，感情的亏损，命运的亏损，人生价值的亏损。多年来的政治动乱，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多少伤痕、缺陷、隐痛啊！是的，许多人的心都冷了，它无法用统计数字来表达，它是比企业亏损更为冷峻的一个现实！

就当黄宗汉做报告的时候，这个厂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正躲在家里教他的两个儿子安装电视机。他名叫何家祥，解放前毕业于北京高工，学的是机械专业；解放后又进入军事通讯学院深造，并多年从事无线电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既懂机械又懂电子，对于电视机工厂来说，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人材。然而，他好不容易从“文化大革命”的牛棚中走出来，又坐上了工厂的冷板凳，闲置一旁，无人问津，他的组长、顶头上司是一位二级工。他患有肾结石，正好告病在家，把浑身本事都用在两个儿子的身上，挖空心思地辅导儿子复习高考教材，手把手地教儿子掌握实验技术。用他的话来说：“儿子考大学，等于在考我。”此外，他还有一条退身之路。他的哥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侄男侄女也都取得了博士学位，两相比较，更令他有怀才不遇之感。他已与国外的亲人取得联系，随时做好拔腿就走的准备。这个饱经政治风霜而变得老于世故的知识分子，在他第一次与新上任的黄厂长迎面相遇时，他的目光是冷漠的、尖刻的、傲慢的，仿佛在说：“谁来办厂还不都是一样！如果有求于你的话，只希望您在我出国的事情上高抬贵手……”

在工厂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坐着一个面孔白晰的年轻人，他名叫高峰倩，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论技术在全厂是第一流的。深思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整天把自己埋藏在一堆电子测试仪器当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他在无言之中包含着比别人更多的心灵创痛。他是干部子弟，他那当过驻外商务参赞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服毒自杀，母亲精神失常跳了楼。他很少对人说起家庭的不幸。在别人的眼里，他的感情似乎凝固了，冻结了，只专心致力于分配给他的“小段包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易了。工厂里赚钱赔钱，人事调动

变迁，一概与他无关。因此，当黄宗汉从他的眼前走过时，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抬……

在严嵩家庙的破楼上，坐着一个容颜开朗的中年妇女，她叫范绿筠，原是中央机关领导的秘书，如今坐守厂部办公室，处于基层日常事务的漩涡中心。当秘书的往往是没有“自我”的，而她却有棱有角，心直口快，主持正义，独当一面，但在无休止的人事和业务的纠缠中变得心疲力惫了。中央某部要把她调回去，她也期望有个安适的归宿。她与黄宗汉恰好是同年，当她见到新厂长时，露出一副惊讶和疑虑的神情：“我正想离开这个地方呢，你倒自己要求往这儿调！我要是你，就不到这儿来干。”

我们的某些基层企业干部似乎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那位古怪的收藏家的癖好，他们的手下拥有一批如龙似虎的人材，却不给这些人材以施展活力的天地。象上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坦率地倾诉了他们在当时的极度苦闷。零散的元件可以组成发光的电路，涣散的人心却难以聚拢。黄宗汉就面对着这个局面。而且，人们并不了解他，对新厂长的所知还不如对电影明星的了解更多。他能行吗？干得了吗？许多人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张口闭口，只知道他是黄宗英的弟弟。这位艺术之家的老四，在会上的慷慨陈词，大概是一时心血来潮，下海，客串，粉墨登台吧。

黄宗汉摇头叹息，向他新结识的同事们说：“我是我们家最没出息的一个！”

立正，向右转

他的话多少有点儿言不由衷。

生长在这个和睦的艺术家庭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成就，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个性：自信、自负和自勉。大概齐这也是“文人相轻”在家庭里的一种表现。

比方说，四弟对三哥的评论是：“要论搞艺术的条件恐怕还不如我，他连句话都说不清楚，抽象思维多于形象思维。不过，此人练功十分刻苦，居然搞出名堂来，谁都没想到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员！”

又如，大哥对三妹清新俊逸的文笔大加赞美，对自己这些年来写作道路上的波折满腹惆怅，感慨之余，还要补充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天下文章属我妹，我妹文章任我改。”

再如，兄长对四弟的评论是：“他是我们家默默无闻的一个，别人甚至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直到最近，文艺界的同行们见了面才对我说，原来你还有一个当厂长的弟弟呀！”

而老四自己呢，他认为没能蜚声文坛，与兄长们并驾齐驱，纯属生活机缘所造成的误会。

他为自己五岁就曾登台演出而自豪。那是在天津的大戏院里，在《秋瑾》一剧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儿子。也许他的戏只是被别人抱在怀里晃了几遭，他的台词只有“哇哇”的几声哭叫，但他的艺龄毕竟应从那时算起。是他们家登台最早的一个。

聪颖、机敏、勤奋、好动、血气方刚、激进向上，他的胆汁型气质早在少年读书时就显露出来。他是北京通县潞河中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兼备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他带领同学们演唱进步歌曲，编排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活报剧，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赤色基调，又有蔚蓝色的自由倾向。即使如此，他的那位热心于宗教宣传的美国女教师还是从几百名学生中一眼看中了他。密斯·蒙特·卡玛丽把他请到自己的一栋小白楼里，

从冰箱里取出一杯冰淇淋，又在钢琴上为他弹奏了一曲耶稣的赞美诗。然后，睁着碧蓝的眼睛注视着他：“毕业后去美国吧，我保送你进神学院深造，费用不成问题，我可以请你住在我家里。”他沉吟片刻。当时他对美国并无直接的恶感，但美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他对国民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充满了反抗和憎恶的情绪。他摇了摇头说：“老师，谢谢您的好意。我不想当个传教士，因为宗教是救不了中国的。我希望到了中国强盛的时候请您再来看看！”

不久，他那鲜明的情感就戏剧性地爆发了。那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站在讲台上的一位男老师，大谈特谈其“当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伸给他”的博爱精神，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在人丛中高声喊道：“先生，如果你认为人们可以在屈辱和压迫下生活，那么，就先拿你来试试看吧。请您把脸伸过来，让我打一记耳光！”全场顿时哗然，同学们热烈鼓掌叫好，而那位老师满脸涨红，尴尬地愣在台上……为了这件事，他被以“侮辱教师”的罪名从学校里开除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那个炎热的夏天，经潞河中学地下党组织联系人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仪式是在景山公园的山坡上履行的。在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介绍人，一个是他，以游山观景遮掩他们的身份，别无选择地安排在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下。因此，至今他对文学作品中描写厂长处于困境时联想到崇祯皇帝孤独的心理描写，抱有本能的反感。他从来不甘孤独，习惯于生活在人与人的旋风之中，并从周围人的身上汲取力量。

他的舞台生涯有着辉煌的一幕，在《大团圆》的多幕话剧中扮演老四。这个剧本是大哥黄宗江创作的，由焦菊隐担任导演。

剧情里不乏黄家兄妹们生活经历的影子，写的是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家人分而复合。但是，国统区一片黑暗，民不聊生，使兄妹们思聚又不得团圆，最后姐姐和四弟毅然出走，奔向解放区去追求光明。同台演出的有孙道临、于是之……净是当代剧坛的精萃。“我是跟当代名角同台演过戏的！”黄宗汉回忆说。那时他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灵气、帅气、略有几分书生气。剧情的结尾也与他的经历不期而合，他是全家人当中第一个入党的，本来真的在筹划奔赴解放区，只是由于组织的需要让他留下，迎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

他所以没能如他的兄长和三姐那样从事于文艺事业，据说是在解放后分配工作时，由于一个可爱的老头儿的疏忽所造成的。

解放军入城后，他接到组织的召唤，匆匆去指定的地点集合。一群生气勃勃、喜笑颜开的年轻人，聚集在一幢小楼前的院子里，每人接过一张表格，简单地填写了几行字。表格送到了小楼上，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而主宰他的命运的那个老头儿，也许忘了他是黄家的老四，或者压根儿就没当一回事。当时的北京百废待兴，许多事情迫在眉睫，更顾不上找每个人谈谈分配的志向。老头儿从楼上走下来，朝大家一挥手：“立正——向右转！”于是，他们这支齐刷刷的队伍，开到宣武区去接管。从此，他坐在区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二十多年政工干部的生涯，与他的家人分道扬镳。

人生有多少十字路口！一抬腿，就踏上了各自生活的延长线。

他历任区委干事、宣传部副部长、区人委街道办事处、钢铁办公室、还有什么联合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市委组

织部，充当所谓“旧市委”主管科技人事工作的一员得力干将。在人事、办事和政治运动之事的圈子里，说干了嘴，磨秃了笔，熬白了头。直至来到东风电视机厂之前，他正坐在北京市电子仪表局的主任办公室里，面临着两种抉择。

政工，无往而不至的职业，在我们的全部生活领域曾经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呵！它凌驾一切，推动一切，冲垮一切。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这个职业发展为空前兴旺的热门。但是，有一天人们终于发现它并不能代替一切，吃这碗饭的人过多，饭碗里的米粒儿就减少。务虚与务实这两个行当如隔山，改行是痛苦的，等于用其所短，弃其所长。一时间，这支队伍当中有许多人感到苦恼与彷徨，茫茫然不知所归。他后悔吗？有点儿后悔。倘若他当初搞艺术的话，他的成就将随着年龄的积累而延伸，至少有了一技之长。回首往事，自己在运动中整过人也挨过整，到头来两败俱伤，颇有虚度年华之感。

上级机关要调他，下级机关要留。他对局领导说：“要留我，得答应一个条件。我在机关里闲得难受，让我去当厂长。”

爱惜人材的领导执意挽留，同意了他的条件：“可以，公司所属的几个大厂随你挑。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如今基层的事不大好办哪。”

“从头儿学徒，试试看。从务虚到务实，学着干点实事儿。”他笑着说，“我这辈子还没当过厂长呢，就让我过过当厂长的瘾吧！”

人皆有瘾。烟瘾、酒瘾、官瘾、财瘾、玩瘾、闲瘾以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瘾……唯独不可没有事业瘾。从务虚到务实并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怕你没瘾。他要在年将半百的时候创造一项三级跳远的罕见纪录：艺术——政工——实业。难

怪诸多的观众拭目以待！

一文不名

“黄宗汉丢了！”新厂长的妻子是个医务工作者，上海人。她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电话里对厂部的秘书范绿筠说：

“这个人，见不着伊的影子，阿拉每日一个人在屋里吃冷饭，请依帮助把伊找回来。”范绿筠也是上海人，她用同样流利的乡音答道：“阿拉也勿晓得伊到啥地方去了，依不要着急，寻寻看吧……”

不光妻子见不到他，厂里的人也见不到他。副厂长焦灼地找他商量生产当中出现的紧急问题，设备科的人找他研究技术改造的方案，会计师的手里攥着一大摞条子找他签字。还有一群倒霉的用户因为电视机没声音或没影象，怒冲冲地涌到厂里，吵吵嚷嚷，找厂长给他们修理、退换。工厂的摊子象个小政府，比政府的职能还要琐碎。职工的病退、顶替、探亲，某家需要派人去奔丧，某人发神经病需要安置，以至某个车间当干部的爸爸打了当工人的女儿一个耳光……都在等待厂长来处理。而黄宗汉却失踪了，就象蓬皮杜忽然从爱丽舍宫里消失那样，上下乱成了一团。

不久，人们就在嘀嘀咕咕地相传：“你知道厂长到哪儿去了吗？听说躲进了北京饭店，他倒美！”

所传非谣，听到的人气得肺都快炸了。此刻，黄宗汉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气派十足地迈进北京饭店的西大厅。

黄宗汉上任之时，就在认真思考着技术设备更新的国产化方案。难道用国产的机械、国产的仪器、国产的工具，直至国